

# 清雍正皇帝兩次遣使赴俄之謎

## ——十八世紀中葉中俄關係之一幕——

李 齊 芳

- 一、前 言
- 二、遣使赴俄前之中亞情況
- 三、滿清雍正皇帝遣使赴俄之動機
- 四、第一次使節之派遣及其到達俄國之經過
- 五、第二次遣使赴俄之經過
- 六、中國史籍中之蛛絲馬跡
- 七、清廷為何隱諱遣使赴俄之史實
- 八、尾 聲

### 一、前 言

清朝因厲行文字獄之故，以致官修史書常多隱諱，而隱諱的事蹟之中在外交史上最具有重要性者莫過於雍正朝（一七二三——一七三五）遣使赴俄一事；根據俄國的歷史資料，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及一七三一年清廷曾兩度派遣使臣正式聘問俄廷，覬見女皇，並舉行重要談判。此乃歷史上中國第一次主動的派遣外交使節至一個歐洲國家，而所有官修史書竟一字未提，這意味着有關此事的文獻必是爲了某種原因而全部銷毀了。至於私人著述，間或有一兩種道及者，亦寥寥數語，沒有引起我國史學家的注意，因而忽略了此一史實的存在。爲着使此一重要外交史蹟不致因中俄關係之長期的疏離而湮沒不彰，本文作者乃在極爲有限的資料中，蒐集西方有關此一史實之傳述以補我國碎篇短節之闕遺。所藉重者以 Bantysh-Kamensky 與 G. Cahen 之著述及 Mancall 與 Ridge 二人之英譯爲主，然後再就其所傳述者以與我國私人著述中所言者相印證，作一有系統的整理和研究，期望能提一線

索，便於日後作更進一層次的探討與闡釋。

## 二、遣使赴俄前之中亞情況

溯源究底，遣使赴俄之事與當時中亞部族勢力之消長有關；從十七世紀的初年起，至十八世紀的六十年代止，歐亞大陸實際上有三個強大的帝國都向着中亞地帶拓展他們的勢力，這三個國家就是滿清帝國、準噶爾(Jungaria)和俄羅斯(Russia)。其中的準噶爾現已不復存在，所以它的歷史少為世人所注意，然在當時，它確是中亞一個舉足輕重的強大國家。嚴格說來，準噶爾只是漠西蒙古之中的一個部落名稱；漠西蒙古的正確名稱應為厄魯特(Eleuths)蒙古，其內部區分，大別為三部：和碩特(Khoshotes)在東，以烏魯木齊(Urumchi)地區為中心，土爾扈特(Turguths)在西，以塔兒巴該臺(Tarbagatai)地區為中心。在兩者之間的是綽羅斯(Choros)，而綽羅斯又分為三部：就是準噶爾(Jungars)、杜爾伯特(Derbets)和輝特(Khoits)。這三部的中心區域是中亞的伊爾提西(Irtysh，舊譯額爾齊斯)河的流域<sup>①</sup>。其中的綽羅斯和輝特在歷史上沒沒無聞，而和碩特、土爾扈特、準噶爾及杜爾伯特四部較為活躍，故常稱漠西四部。其種族均屬於蒙古，統治人物大致部與成吉思汗一族保有或多或少的血緣關係。準噶爾在第十六世紀的末期即已興起，在和多和親(Khotokhotsin)的領導之下，建立了一個永久的都城於艾米爾(Emil)河的南岸(今新疆省塔城的西北)，漸漸採用定居的風習，元首以巴圖爾琿台吉(Batur Kontaisha)(皇太子的轉音)為稱號<sup>②</sup>。因為地域上的方便，與俄羅斯早就有了頻繁的交往，從俄羅斯那裏獲得了戰爭用的火器、製槍炮的工匠和各種牲畜，國力隨之日益強盛，杜爾伯特被其征服，其他兩部也不能抗禦，和碩特人被迫遷入現在的青海省境內，後來還是被它併吞<sup>③</sup>。在第十七世紀的初年，土爾扈特人被迫遷入裏海(Caspian Sea)之北的伏爾加河及頓河流域(Volga-Don Valley)<sup>④</sup>距離較遠，暫得保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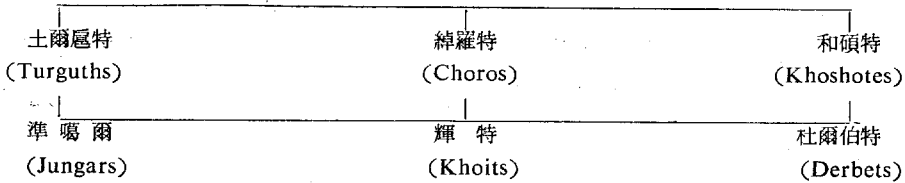
① Fang Chao-ying, "Galdan", in Arthur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Vol. I, P. 265; Fang Chao-ying, "Tulisen," *op. cit.*, Vol. II, p. 785.

② *Ibid.*, Vol. I, pp. 265-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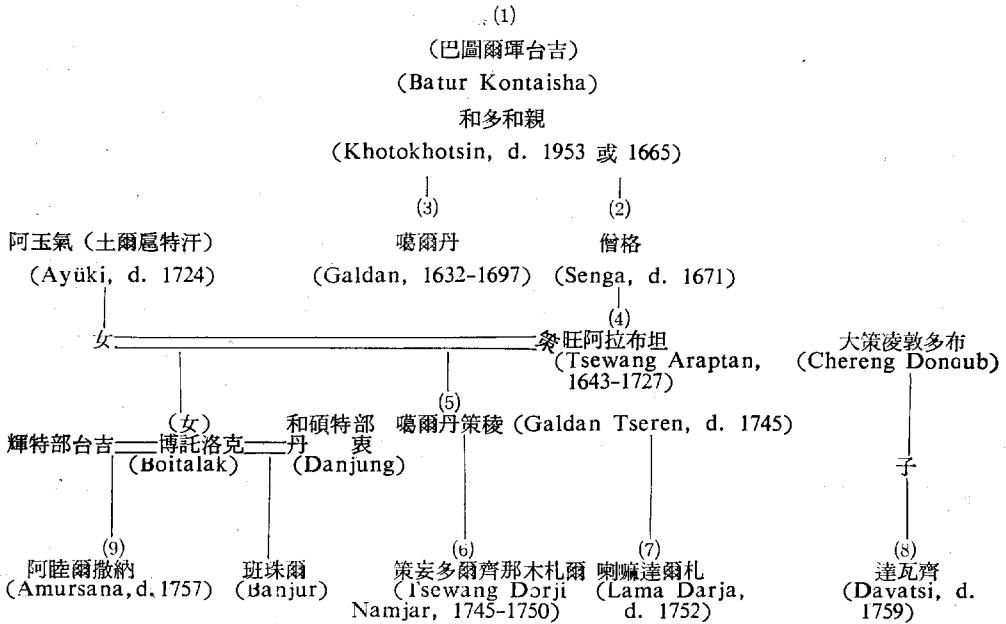
③ *Ibid.*, Vol. I, pp. 265-266.

④ *Ibid.*, vol. II, pp. 265-266.

(一)厄魯特蒙古的分部：  
厄魯特 (Eleuths)



(二)準噶爾統治者的世系：



前面提到準噶爾的第一個雄主和多和親有子十二人，他死後由其第六子僧格 (Senga) 繼位，其長兄車臣 (Tsetsen) 很嫉視他，於一六七一年攻殺之而竊立。僧格的同母弟噶爾丹 (Galdan) 當時在西藏剃度為喇嘛，並受喇嘛教的教養，聽到他哥哥僧格被謀殺的消息，即自西藏返準噶爾，破戒還俗，擊殺其長兄車臣，自稱台吉，並娶和碩特的鄂齊爾圖汗 (Ochirtu Khan) 之女為妻，但不久他藉故攻殺了他的岳父而搶掠和碩特的游牧地為己有，藉此權勢，遂自稱琿台吉。一六七八年，他率兵侵入喀什噶爾 (Kashgar)、雅爾罕 (Yarkand) 及其他天山南路的城邦，置官收稅，把東土耳其斯坦全部收在他的統治之下。一六七九年，西藏的達賴喇嘛就因而加封他為博碩克圖汗 (Bushktu Khan)<sup>⑤</sup>。他此時已統一了厄魯特的各部及天山

⑤ *Ibid.*, Vol. I, pp. 265-266;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 (臺北：華文書局，一九六四影印一七四一年原版本)，卷七八，頁 15a-b。

南路的一部份，於是繼續向東擴展，前鋒達到哈密和吐魯番一帶<sup>⑥</sup>。一六八七年，噶爾丹帶領三萬人馬，藉故東侵漠北的喀爾喀(Khalkas)蒙古(現外蒙古地帶)，因為喀爾喀人早已臣服了滿清，滿清的康熙皇帝(一六六二——一七二二)不得不採取軍事行動，以後就在漠北地區斷斷續續的發生了多次戰爭，直到一六九七年噶爾丹死時方告一段落<sup>⑦</sup>。

繼噶爾丹而當權的準噶爾領袖是策旺阿拉布坦(Tsewang, Araptan, 1643-1727)，他是噶爾丹的姪兒，於一六九七年繼位，是準噶爾最有才能的君主之一。在他的統治之下，準噶爾的領土東部擴展到哈密的附近，西部包括巴爾喀什湖(Lake Balkash)地帶及西伯利亞之一部。中亞的吉爾吉斯(Kirghiz)人、哈薩克(Kazakhs)人及土爾扈特人一時都屈服於他的威勢之下。一七一五年和一七二〇年曾兩度與俄羅斯發生衝突，俘獲了若干名在俄軍中服役的瑞典人，最著名的如名任納特(Renat)的瑞典軍官<sup>⑧</sup>。以後俄準之間維持了三十多年的和平。準噶爾國境內的農工商業均甚發達，成為當時中亞最繁榮的國家。策旺死後，由他的長子噶爾丹策稜(Galdan Tseren)繼立為主，他雖然生性嚴厲，但也很有才能；曾於一七三一年率領大軍邀擊滿清帝國的官兵，和通泊之役把清軍打得大敗，擄掠眾多，自後斷斷續續與清軍纏戰達四年之久，至一七三八與一七三九年之間，才與滿清帝國訂約休戰，劃阿爾泰山為清準兩國的邊界，休養生息，境內更為繁盛<sup>⑨</sup>。直到一七四四年，境內發生疫症，出痘死者甚眾，重要的宰桑(貴族)多人出痘身亡，而噶爾丹策稜也恐怕傳染痘症，就逃往北部邊境藏避，國內遂呈現不安現象，所屬吉爾吉斯頭目乘機作亂，噶爾丹策稜不得已乃回伊犁調兵定亂<sup>⑩</sup>，但未收效果。一七四五年噶爾丹策稜病亡，由他十二歲的嫡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Tsewang Dorji Namjar)繼立，才引起了策稜諸子之間的內爭及滿清入侵的後果<sup>⑪</sup>。

### 三、滿清雍正皇帝遣使赴俄之動機

滿清帝國的康熙皇帝於一七二二年十二月逝世，由他的第四子胤禛繼位，是為

⑥ Fang Chao-ying, "Galdan," *op. cit.*, p. 266.

⑦ *Ibid.*, Vol. I, pp. 266-268.

⑧ Fang Chao-ying, "Tsewang Araptan," *op. cit.*, Vol. II, pp. 758-759.

⑨ *Ibid.*, *op. cit.*, vol. II, p. 759.

⑩ 王先謙，東華錄(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六三影印一八八四年上海王氏活字版)，乾隆朝，第一冊，卷七，頁12b-13a.

⑪ Fang Chao-ying, "Tsewang Araptan," *op. cit.*, Vol. II, p. 759.

雍正皇帝（一七二三——一七三五）。那時策旺還健在；策旺的政策是一方面與俄羅斯維持和平，另一方面東向進兵蒙古而與滿清帝國爭雄，滿清費了很大的軍力才把準噶爾自蒙古南侵的峰頭擋住，一七二三年滿清的勢力雖進入了西藏地帶，但在西藏地區的統治權力並未穩固，一般不願屈服於滿清的藏人有很多逃往準噶爾去歸附策旺。又因徙居於伏爾加——頓河流域的土爾扈特部的領袖阿玉氣（Ayüki）之女就是策旺的妻子<sup>⑫</sup>，他們同種又同信佛教，頗有合流的傾向。同時，策妄曾於一七二〇年遣使波羅肯尼干（Borokene-gan）至聖彼得堡，覬見沙皇彼得大帝（一六八二——一七二五），請與俄廷締結防守同盟，以抗滿清帝國，許俄人在其境內有開礦之權<sup>⑬</sup>。因而俄國也於一七二三年派遣溫濶甫斯基（Unkovsky）為使臣去見策旺，建議：準噶爾如接收藩屬於俄國的名份，俄國就可以對滿清帝國採取強硬的立場，並準備在必要時作軍事示威的行動<sup>⑭</sup>。他們的談判雖未成功，但是準噶爾與俄羅斯之間的和睦邦交仍舊是導向締結同盟的良好基礎。這些對滿清帝國不利的現象，雍正皇帝當然看得非常清楚而感到不安，這從他即位之後就積極與俄國締訂了恰克圖條約（The Treaty of Kiakhta, 1727）的態度中可以看出，然而恰克圖條約只解決了在蒙古方面的問題，並未能解除來自中亞的威脅。如要解除來自中亞的威脅，必需採取軍事行動；所以他在採取軍事行動之前，不能不顧慮到俄國的意向，並且不惜以最友好的態度和優厚的條件換取俄國的合作，以阻遏俄國與準噶爾同盟之實現。

第二個促成雍正皇帝遣使赴俄的重要因素與他奪位的陰謀有關。現在一般研究清史的人，大致都認為雍正並非康熙皇帝指定的皇位繼承人。原來康熙皇帝有子三十五人，並且已經立了皇二子胤礽為太子，後來因為胤礽的行為常踰宮廷的體制，終被廢黜<sup>⑮</sup>，自此以後就不再立皇太子。康熙皇帝在位日久，皇子們多已長大成人，且都受了良好的教育，又因康熙皇帝親近耶穌會教士，常指派教士為皇子們的師友，所以他們의思想和行為多受教士們的影響。康熙皇帝晚年既沒有皇儲，年長而有才能的皇子們當然免不了各懷繼位的圖謀，他們所親近的教士們也有參與或知悉此項圖謀者，例如皇九子胤禛（一六八三——一七二六）的擁護者之中有一個名

<sup>⑫</sup> Immanuel C. Y.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53.

<sup>⑬</sup> 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昆明：雲南大學文法學院，一九四七），頁四一。

<sup>⑭</sup> *Ibid.*, pp. 41-42.

<sup>⑮</sup> Fang Chao-ying, "Yin-jeng," in Arthur W. Hummel, *op. cit.*, Vol. II, 924-925.

穆敬遠(Jean Mourao, 1681-1726)者，就是一個熱衷參預圖謀的葡萄牙教士。此外支持胤禔的還有皇十子胤祺（一六八二——一七四一）和蘇努（一六四八——一七二五）以及蘇努的兩個兒子。蘇努是雍正皇帝的堂兄弟，他的第六子勒什亨（天主教名類斯 Louis）及十二子烏爾陳（教名若瑟 Joseph）都是天主教徒，他們雖然都擁護胤禔為繼位者，可是胤禔自己卻衷心的支持皇八子胤禩（一六八一——一七一六）和皇十四子胤禵（一六八八——一七五五）；胤禵與雍正皇帝同母，他才是康熙皇帝所指定的合法繼位人。照後來株連的情形來看，大概有十五個皇子都曾參預奪位的圖謀。圖謀的本身與天主教無關，不過信仰天主教義的人多指責雍正皇帝奪位的行為是邪惡的<sup>⑯</sup>，所以才引起雍正皇帝對教士個人之猜忌和憤恨<sup>⑰</sup>，因此他除了以嚴酷的手段對待那些有奪位預謀的兄弟們而外，在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就開始禁止天主教士在各地傳教<sup>⑱</sup>。由於他對歐洲的宗教還有相當的了解，所以他一方面限制天主教的傳播，另一方面又非常優容的允許俄國的東正教在北京建立教堂，並且允許俄國的東正教教士長住北京，為俄國居民及留學生們執行宗教事務<sup>⑲</sup>。從這些事實看來，他確有引進東正教派以抵制天主教的企圖<sup>⑳</sup>，想以宗教上的讓步來換取俄國的政治上的支持。

第三個促成雍正皇帝遣使赴俄的重要因素是滿清朝廷要保持與土爾扈特的聯繫。前面已經提到土爾扈特因受準噶爾的壓力而於一六一六年西遷伏爾加——頓河流域的經過；土爾扈特遠遷後，由於他們信仰佛教，所以始終與西藏保持着密切的關係，滿清朝廷也想利用他們牽制準噶爾，曾於一七一二（康熙五十一年）派圖理琛去通聘安撫，當時土爾扈特的領袖阿玉氣汗就向圖理琛建議：清廷應多與俄羅斯通聘週旋，以免其阻梗滿清與土爾扈特之間親睦關係的發展<sup>㉑</sup>。而且他認為中亞的任何事務，俄羅斯都應分享重要的責任<sup>㉒</sup>。圖理琛是雍正時談判恰克圖條約的重要人物，他訪問土爾扈特歸來以後的外交言論，當然會為雍正皇帝所重視。

<sup>⑯</sup> Fang Chao-ying, "Sunu," in Arthur W. Hummel, *op. cit.*, Vol. II, pp. 693; 694.

<sup>⑰</sup> *Ibid.*, p. 694.

<sup>⑱</sup>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65), p. 62.

<sup>⑲</sup> 何秋濤，朔方備乘（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六四影印一八六〇版），卷九，頁三——二）。

<sup>⑳</sup>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op. cit.*, p. 50.

<sup>㉑</sup> Fang Chao-ying, "Tulisen," in Arthur W. Hummel, *op. cit.*, Vol. II, p. 785.

<sup>㉒</sup> Mark Mancall, "China's First Missions to Russia, 1729-1731," in *Papers on China* (Committee on Regional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55), Vol. 9, p. 84.

#### 四、第一次使節之派遣及其到達俄國之經過

基於上述的各種因素，當然滿清朝廷早就有與俄國溝通的需要。但是此一遣使的朝議是怎樣發起的？遣使的決策與人選是怎樣製定的？遣使的目的及訓令的內容如何？在清朝的官吏及朝臣的奏章之類的資料中都尋不出任何的線索。

至於使節團在俄國的一切外交活動，更尋不出絲毫的痕跡，然在俄國史料中卻保存着完整的紀錄。俄國保存着的清俄關係的資料中有一件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五月六日（中國舊曆）發自北京的公函，文中宣示：滿清皇帝因為俄國沙皇陛下曾派使臣至北京賀其即位之故<sup>⑳</sup>，甚願派一使節團至俄京報聘，以表答謝之意。一七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俄國沙皇彼得二世（Peter II, 1727-1730）覆書，宣明已訓令俄國文武官員，將以完備的禮節迎接中國使臣於國界，並護送其至俄京。為達成此項任務，俄廷將派遣高級官員一名至色楞金斯克（Selenginsk）恭迎使節<sup>㉑</sup>。同月三十一日，伊凡·格勒朱諾夫（Ivan Glazbnov）接受沙皇彼得的訓令，馳赴鄰近蒙古邊境的色楞金斯克，負責監督歡迎中國使臣的一切任務，其監督的地區包括色楞金斯克、伊爾庫茨克（Irkutsk）及托波爾斯克（Tobolsk）三個主要城市。因為滿清朝廷通知俄廷的國書發出後不久使節團即已啟程，及至他們在八月十一日到達了恰克圖的時候，俄京尚未收到是項國書，所以俄方還沒有任何的準備，於是使節團全部人馬就在那裏等了六個多月，到一七三〇年的二月，正在不耐煩而準備回北京之際，方得到了俄方的通知，請使節團到色楞金斯克去。三月三日，伊凡·格勒朱諾夫達到色城，即刻與中國使節團取得聯繫<sup>㉒</sup>。

滿清帝國的使節團分為兩組，每組五人，一組遣至俄廷，另一組遣至土爾扈特汗國。使節團的最高領袖名托時。除使節團的成員而外，還有大量的侍從和僕役隨行。托時是滿人，此次使俄，攜帶的有滿清皇帝慶賀俄國沙皇即位的禮物，並有理藩院致俄國參政院（Senate）的文書。至於使節團的主要任務，托時告訴俄方人員說，要等到覲見沙皇時再作口頭報告<sup>㉓</sup>。使節團於五月三十一日從色楞金斯克啟

<sup>⑳</sup> *Ibid.*, Vol. 9, pp. 85-86; 清廷所指係一七二六年到北京的 Sava Vladislavich 大使。詳情見本文第七節。

<sup>㉑</sup> Mark Mancall, *op cit.*, Vol. 9, p. 86.

<sup>㉒</sup> *Ibid.*, Vol. 9, p. 86.

<sup>㉓</sup> *Ibid.*, Vol. 9, pp. 86-87; Bantysh-Kamensky, *Diplomaticheskoe Sobranie Del mezhdru Rossiiskim i Kitaiskim Gosuderstvami s 1619 pp 1792 goda* (Kazan: Tipografia Imperatorskago Universiteta, 1882), p. 175.

程，八月十一日到托波爾斯克。十一月三十日才再從托城啟程，一共乘了一百八十一部馬車，向莫斯科進發。遣赴土爾扈特汗國的使團，也同道到莫斯科去，然後再從莫斯科向伏爾加流域進發。這是遵照俄國參政院的指示而安排的行程，以顯示俄羅斯對其帝國領域之內的外族，仍必須施行相當程度的控制<sup>②⑦</sup>。

當時俄羅斯的沙皇彼得二世已於一七三〇年一月結婚的前夕逝世，繼立的是他的姑母安妮女皇（Anne Ivanovna，一七三〇——一七四〇）。格勒朱諾夫在路上無意中說出上項實情之後，滿清使節很鎮靜的請俄方最好等到了莫斯科後再作正式聲明，否則使節團將被迫在中途折回北京，換取新的國書和聽取新的訓令<sup>②⑧</sup>。使節團一行都受到沿途各城市的鳴炮歡迎和熱誠的招待。一七三一年一月九日，抵達莫斯科的近郊，在亞列克賽耶夫斯基（Aleksievskii）村停留下來休息，準備入城的一切儀式。第三天，國務大臣彼得·柯爾巴托夫（Peter Kurbatov）代表俄廷前來表示歡迎之意，並致送禮品。一月十三日，使節團又從亞村遷移到坐落在城郊屬於前樞密大臣索特可夫（Count Fedorovich Saltykov）的府第，隨即受到盛宴的款待，並有宮中樂隊演奏音樂佐膳。次日，使節團分乘九輛馬車進入莫斯科，行至紅場，受到鼓樂及鳴炮三十一響的敬禮。同月十五日，樞密大臣司特本諾夫（Stepanov）至使節團寓所拜訪，其目的在探詢謁見女皇的儀式，並傳達女皇的問候之意。二十一日，司氏再度拜訪，詢問使節團此行的主要目的。使節團告訴他說<sup>②⑨</sup>，他們是被派遣來慶賀女皇的即位和致送禮品的，並且攜帶了理藩院致參政院的公函。尚有北京朝廷的其他訓令，他們將在與參政院會談時再作口頭傳報。最後還提到他們原來並未期望有謁見女皇的榮寵，如果女皇陛下願賜予使臣一次進侍之機，他們極願面達滿清皇帝祝賀之忱。此一會談雙方獲得一致的結論，即滿清皇帝的禮物將在一月二十六日使節團謁見女皇時當面進呈<sup>③⑩</sup>。

陛見之日，使節團所携禮物，分裝一十八個大箱，以九輛馬車分載，排列在使節團的禮車之前，向克里姆林（Kremlin）宮進發，行至宮門，接受儀隊鼓樂的敬禮，隨即展開三度歡迎的儀式：第一次在宮門外，第二次在宮門，第三次在陛見殿的入口。只有一部份品位高的使節團團員獲准入殿，其餘的人則佇立於殿門之外。使節團入殿後，向女皇下跪，將金色錦緞的國書遞交國務大臣，國務大臣再呈放在

<sup>②⑦</sup> Mark Mancall, *op. cit.*, Vol. 9, p. 86.

<sup>②⑧</sup> Bantysh-Kamensky, *op. cit.*, p. 186; Mark Mancall, *op. cit.*, Vol. 9, pp. 86-87.

<sup>②⑨</sup> Mark Mancall, *op. cit.*, Vol. 9, pp. 87.

<sup>③⑩</sup> *Ibid.*, Vol. 9, p. 87.



御前的案上。此時使節團團長托時依然跪在殿前，並發表一篇簡短的漢文或滿文演講，當即有人譯為俄文，俄國女皇隨即致答詞，然後使節團行叩首禮三次，祝賀女皇，又再度發表一篇演講，重行三次叩首之禮，始退出宮殿，返回駐節的官邸，與俄方朝臣共同參與賜宴。此次安妮女皇所收到的禮品有金絲鑲滾的銀貂、錦緞、瓷器及精美的漆器等<sup>①</sup>。

使節團的真正目的，在其致俄國參政院的文書中透露出來。此文書的開始，把中亞的情況作了一個簡短的敘述，隨即就提出四項建議，第一，滿清皇帝在其征討準噶爾的軍事行動中，清軍或有越入俄境之必要，在此項行動發生之時，希望俄方不要採取抗禦的措施。第二，清軍得在俄境追捕準噶爾的逃兵。第三，如果準噶爾的部眾有降俄方者，希望俄方將其部酋解送清方議處，部眾則請俄方將其禁錮於有嚴密禦防設備的地方，以免其再聚結在邊境作亂。第四，請求俄廷儘速護送使節團的人員到土爾扈特去，並請設法早日護送兩個使節團返回中國。這些建議都陳述得非常技巧，企圖解決滿清帝國在中亞所面臨的一些問題為主旨，希望俄國允許清兵越界追擊敵人，防止準噶爾的領袖有重整兵力與東山再起的機會。最有趣的是要求俄國的合作，呼籲土爾扈特歸向滿清。這些幾乎類似於締結同盟的條款之要求，雖然並未獲得俄方的全部贊許而滿足滿清的期望，但後來在實質上卻予滿清以最大的協助，使其能收中亞軍事行動的全功。俄國女皇當時的答覆與以後談判的結論大致相同，包括下列的四點。第一，女皇的願望是兩國邊境的安寧，因之滿清的軍隊應該以友好的態度來維持和平。第二，女皇雖不贊同外國軍隊進入俄國的領土，但她為保持兩國的友誼之故，願勉從滿清皇帝的要求。第三，如果與滿清皇帝為敵的軍隊逃入俄國領土，俄國官吏將受命去監視那些越界的亡命之徒，使他們不致有任何反抗滿清的舉措。至於解送個別部酋至清方議處之事，將視日後情況如何而定，如有必要，雙方屆時當再舉行談判。最後有關滿清遣使至土爾扈特一項，女皇為兩國親善之故，特允該使節團前往，但自後滿清與土爾扈特之間的一切溝通，均需經由俄國參政院轉達，而且土爾扈特業已被認為女皇陛下的臣民，有關該部事務，還需聽候女皇陛下的命令與決定<sup>②</sup>。由此可以看出，滿清朝廷所獲得的是俄方對清兵越界追擊敵人與羈留逃亡之徒的承諾，但締結引渡條款的請求被婉拒。此次以後，與土爾扈特的直接溝通也遭到否定。

<sup>①</sup> *Ibid.*, Vol. 9, pp. 87-88.

<sup>②</sup> Bantysh-Kamensky, *op. cit.*, pp. 175-176; Mark Mancall, *op. cit.*, Vol. 9, pp. 88-89.

當時是俄曆一七三〇年的一月的二十八日，恰逢安妮女皇二十二歲的生日，因此滿清使節團又被邀請至宮中宴會，會後清俄雙方還舉行了部長級的會議。三月一日，使節團又被邀至參政院進見國務大臣哥洛夫金（Golovkin）、副大臣奧斯特曼（Osterman）、雅古申斯基（Yaguzhinsky）及代理樞密院院長車爾克斯基（Cherka sky）親王等人，在會中對使節團所提出之案件均一一與以答覆。土爾扈特的問題在會中又再度的提出，俄方又再度對該區之控制權予以明確的肯定。三月二日，使節團再度覲見女皇，向其告辭，一切禮節與第一次覲見相同。在啟程之前，俄方亦以禮物答謝滿清：贈予清帝者為金銀絲織錦緞三件，價值一千三百盧布。黑貂四十七件，價值二千零七十盧布。黑色與棕色狐皮十八件，價值七百三十盧布。此外還賜予使節等人黑貂、狐皮及白底黑斑的貂皮多件，價值四千盧布<sup>③</sup>。三月八日，使節團分為兩組，同時自莫斯科啟程；第一組直趨托波爾斯克。第二組去土爾扈特，直到十一月才回返到托波爾斯克與第一組會合，於十一月三十日一同繼續歸國的旅程。到一七三二年元旦日才抵達托姆斯克（Tomsk）。依照使節團所得的訓令，他們應該與護送的官員如參政院秘書巴枯寧（Bakunin）之輩在此地舉行會議，所討論的主題有四個：第一個是有關韃靼人的問題；韃靼人為完全居住在俄國領土之內的居民，卻同時向俄國和準噶爾兩個國家進貢，因而俄準兩國都以宗主國自命，要求對韃靼人的管轄權。清廷既然為着要對準噶爾採取軍事行動的計劃而來，當然對俄準兩屬的韃靼人問題頗表關切。第二個是有關俄國與準噶爾互遣外交使節的問題；準噶爾早就派有使節駐莫斯科，而俄國也派有武官駐節在噶爾丹策稜之處，滿清對此，當然異常關切，企圖盡力防止俄準締結同盟情事之發生。第三個主題是要求俄國派遣一個使節團到北京去報聘，有來有往，才不致損及雍正皇帝在朝廷的威望<sup>④</sup>。第四個討論的主題非常奇特；清方企圖通過俄國，派遣一個使節團到土耳其 Turkey 去，希望俄國予以可能的協助。此事顯示滿清朝廷非常急切的想與立國於回教文化中心的國家建立關係，以便對居住在滿清帝國以內的回民發生某些程度的影響。同時也有大量的回民在準噶爾的統治之下，這不能不使清方在對準噶爾採取決定性的策略之前，期盼從土耳其的影響中，能獲得某些回教集團的合作。對於這些問題，巴枯寧都未能給予明確的答覆。一七三二年一月八日，使節團自托姆斯克啟程，二月十四日到達中國邊境，謝別護送的俄方人員，經過蒙古，向北京進

<sup>③</sup> Bantysh-Kamensky, *op. cit.*, p. 182, n. 1; Mark Mancall, *op. cit.*, Vol. 9, p. 89.

<sup>④</sup> Bantysh-Kamensky, *op. cit.*, p. 191; Mark Mancall, *op. cit.*, Vol. 9, pp. 89-90.

發<sup>⑤</sup>。據俄方統計，此次俄方爲招待使節團而耗費了兩萬六千六百七十六個盧布零九十九個柯柏克 (Kopecks) <sup>⑥</sup>。

此一使節團尚未回國之際，滿清朝廷已採取一項對俄國平民示惠的措施；在一七三一年之內，俄國參政院已收到清廷理藩院於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四月二十八日發出的一封公文，該文明白宣示，對俄國一般官吏及平民歡迎與護送使節之殷勤非常感謝，爲此特派專人立即運送價值十萬銀兩（十三萬盧布）的錦緞、南京棉布、各色寶石、花緞、粗絲織錦、絲綉、草帽鞭及成衣等禮物至中俄邊境，請俄方派遣官吏接收，並請代爲分贈給一般吏民。清廷隨後派遣理藩院一名高級官員諾薩 (Nosha) 押送上項禮品至恰克圖，當即通知色楞金斯克的地方政府官吏。色城的指揮官布霍爾茨 (Bukhots) 按單接收了上項禮品，分裝成四百六十八箱，運送到莫斯科去。運輸費達到三千八百三十一個盧布零四十個柯柏克<sup>⑦</sup>。一七三三年二月十二日，運達莫斯科。俄廷經過幾度的選擇與商量，到十一月分才贈給五名權要而並未惠及平民。這五名權要是比隆伯爵 (Count Biron)、列文瓦爾伯爵 (Count Levenvol'd)、奧斯特曼伯爵、雅古申斯克將軍及車爾克斯基親王。分配剩餘的部份則賜給了外交部的官員<sup>⑧</sup>。

在這封理藩院的同一公文內又提到土爾扈特的一件事；就是有若干土爾扈特人曾經到西藏去晉見達賴喇嘛，當時已轉道到北京，清廷正準備派遣官員護送他們回伏爾加流域去，因爲此一行程必需通過俄國境內，所以希望俄方准其入境，並護送他們回去<sup>⑨</sup>。

## 五、第二次遣使赴俄之經過

前面已經提及，俄國沙皇彼得二世已於一七三〇年一月逝世，俄廷隨後把他的死訊和安妮女皇即位的國情正式通知滿清朝廷。因爲清廷第一次的使節團所攜帶的國書是給彼得二世的，所以雍正皇帝爲尊重俄方起見，立即派遣了第二個使節團攜帶着致送安妮女皇的國書，未及等待第一個使節團歸國，就首途赴俄。一七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到達恰克圖，俄方指揮官巴枯寧請他們在那裏等待俄方的歡迎及護

<sup>⑤</sup> Mark Mancall, *op. cit.*, Vol 9, pp. 90; 91.

<sup>⑥</sup> Bantysh-Kamensky, *op. cit.*, p. 191, n. 1.

<sup>⑦</sup> *Ibid.*, p. 190.

<sup>⑧</sup> *Ibid.*, pp. 189-190, n. 3.

<sup>⑨</sup> Mark Mancall, *op. cit.*, Vol. 9, p. 91.

送人員，當俄國參政院獲得清廷已另遣一個新使節團的訊息之時，隨即就向伊爾庫茨克的副總督發出指令，要他負責自中國邊境迎接並護送該使節團至俄京的一切事宜，但應注意的一點，就是絕不要允許使節團中的任何成員通過俄國領土到土爾扈特去。此次滿清朝廷本來也曾派遣了兩個使節團；一個是到俄廷去的，共有三人，以德新(譯音)爲首；另一組是到土爾扈特去的，共三人，以班第(d. 1755)爲首。後者到達邊境時，得知俄國不允假道，這一組遂轉回北京。俄國還訓令巴枯寧在托波爾斯克等待使節團，然後同至俄京(此時爲聖彼得堡)。第二使節團派遣之時，第一使節團尚在途中，並未歸國。第二使節團是一七三一年十月初旬通過伊爾庫茨克的，至次年(一七三二)一月八日，兩個使節團在株凌(Chulim)河流域的赫達(Chardot)村相遇，並舉行會談，會談之後，各奔前程，而巴枯寧則護送第二使節團向西進發，於一七三二年二月十八日抵達托波爾斯克，在此接收自俄廷送來的訓令，然後兼程前進。大約在四月十八日，他們越過了莫斯科及其近郊的離宮別院，達到了亞歷山德羅夫斯基(Aleksandrovsky)修道院的所在，在那兒與俄廷派遣來的一位代表舉行會談。四月二十七日到達首都聖彼得堡，舉行正式入城的儀式；使節們坐的是馬車，有三個聯隊的陸軍士兵夾道迎衛，鼓樂齊奏，並由海軍鳴炮三十一響。一切歡迎與覲見的儀節與第一次使節團的相同<sup>④</sup>；次日，即四月二十八日，入宮覲見女皇。這一天恰逢是安妮女皇加冕的紀念日，因此禮節異常隆重，使節團團長通過一排一排歡迎的行列後，進入殿中，並在殿中央向女皇下跪，呈遞理藩院的兩封文件給副國務大臣奧斯特曼伯爵(國務大臣哥洛夫金伯爵因患痛風未能出席)，奧伯爵轉身將文件放置於女皇前面的案上，而安妮女皇則端坐於皇蓋之下，接受使節團的叩首禮，然後由德新大使發表兩次講演，第一次是傳達雍正皇帝的問候之意，並保證清俄兩國間的友誼之繼續不變。第二次是表示大使本人對其能在女皇陛下加冕的紀念日獲得覲見之殊榮，深感榮幸。安妮也兩次以優辭作答。當日又請使節們到宮中參加兩位親王主持的宴會，宴後，被邀欣賞著名的聲樂與樂器的演奏會。晚間，還參加了一個衣香鬢豔的舞會，並觀賞了一場光彩奇麗的烟火<sup>⑤</sup>。

覲見時所呈遞理藩院第一封公文的内容與大使所發表的講辭相同，第二封公文是對布霍爾茨(Bukholts)上校致蒙古土謝圖汗信函中所述之事實表示滿意，該信說如有蒙古人逃亡入俄境者，人畜皆予以流放。兩封公文的日期都是雍正九年二月

<sup>④</sup> *Ibid.*, Vol. 9, pp. 92-93; Bantysh-Kamensky, *op. cit.*, p. 191,

<sup>⑤</sup> Mark Mancall, *op. cit.*, Vol. 9, p. 93; Bantysh-Kamensky, *op. cit.*, p. 192.

三日<sup>④②</sup>。

一七三二年五月十二日，滿清皇帝贈送給俄羅斯女皇的禮物運到冬宮，共計有十九箱；其中包括大理石器物、瓷器、漆器、皮革物品以及各色絲緞。俄廷也有禮品回贈，贈予清帝的為豔紅與金絲的錦緞，都鑲有天鵝絨的花彩，計值一萬五千八百零二個盧布。同時還有價值三千盧布的西伯利亞式的傢俱。又賜給清方使節每人現金一千盧布及四匹羽紗，賜予每一位秘書五百盧布及兩匹羽紗<sup>④③</sup>。七月九日，使節團再度覲見女皇辭行，覲見禮儀與第一次的相同。覲見以後，他們曾去拜訪仍在養病中的國務大臣，並接收一封給理藩院的覆信。這一封覆信主要的是俄廷對滿清帝國友誼之保證與兩國和睦之期望。同時也提到了兩國間的各種小問題。這封覆書的日期是一七三二年七月十三日，不是發自參政院，而是發自帝國法院的外交事務處 (Imperial Tribunal Administering Foreign Affairs)。因此清方拒絕收受，並且於一七三三年九月十九日退還俄方，請其遵照一七二七年恰克圖條約的規定，由參政院改寫。俄方只得照辦，並於一七三四年一月送達清方<sup>④④</sup>。此是後話。

使節團於一七三二年七月十五日離開聖彼得堡，十二日後到達莫斯科，在該處受到盛大的招待，還被請去參觀工廠。八月二日，才從莫斯科分乘一百輛馬車啟行，由兩位高級官員護送。在下諾弗哥羅城 (Nizhni Novgorod) 改乘兩隻大船，自伏爾加河航行至喀山 (Kazan)，再又換乘馬車繼續前進，於九月二十一日抵托波爾斯克城。十一月到托姆斯克。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伊爾庫茨克。一七三三年一月二十日到達色楞金斯克。從那裏再經過世二十三天的行程，就到達了中國的邊界。使節團在該處發表正式聲明，感謝俄國官方一切盛情與榮寵的招待。然後告別俄方護送官員，越過邊境，自行向北京進發<sup>④⑤</sup>。事後經俄方發表，為此次使節的護送招待，共耗費了二萬二千四百六十個盧布零六十個柯柏克<sup>④⑥</sup>。

## 六、中國史籍中之蛛絲馬跡

俄國方面的資料，記載得詳實動人，顯示他們非常重視此兩次使節的前往訪

<sup>④②</sup> Mark Mancall, *op. cit.*, Vol.9, p. 93.

<sup>④③</sup> Bantysh-Kamensky, *op. cit.*, p. 201, n. 3 & 4.

<sup>④④</sup> Mark Mancall, *op. cit.*, Vol. 9, pp. 93-94.

<sup>④⑤</sup> *Ibid.*, Vol. 9, p. 94; Bantysh-Kamensky, *op. cit.*, p. 203.

<sup>④⑥</sup> Bantysh-Kamensky, *op. cit.*, p. 203, n. 2.

問。反觀中國，此兩次遣使赴俄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實不亞於俄國，然而官史上並無任何紀錄，只有非官方的資料中才發現有少許的蛛絲馬跡，可與俄國的史料相印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資料都是在清代末年才公開發表的。第一部書敘述此事的是陳康祺所編撰的郎潛紀聞；陳康祺是同治十年（一八七一）的進士，生平事業不詳。這部書共三十二卷（初聞十四卷，二聞六卷，三聞十二卷），前面有陳康祺本人在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寫的序。全書都是摘錄或敘述前此未曾發表過的異聞與軼事，其中有一個簡短的托時傳，在第五卷第一頁的後半頁有如下的兩句話：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以革職倉場侍郎托時賞加侍郎銜，出使俄羅斯。十年（一七三二），使回。……<sup>⑭</sup>。

傳中其他事跡均與出使俄國之事無關。清史稿與清史兩書中都無托時的傳記，只在卿式的年表中有他的名字出現。他是正黃旗人，姓佟佳，托時是他的名字。早年以筆帖式出身而漸遷至內閣侍讀學士兼侍郎之職。他也沒有任何出使俄國的日記之類的記錄遺留下來。

第二部書提到此次遣使的是李桓（一八二七——一八九一）編的國朝耆獻類徵。李桓是湖南湘陰人，生平事業亦不詳。這部三百卷的書是他自己出資刊印。出版日期大約是從光緒十年至十六年（一八八四——一八九〇）。卷七十二有一托時傳，非常簡略，所述與郎潛紀聞中的大致相同。原文如下：

……七年（一七二九），賞（托時）侍郎銜出使俄羅斯。八年，襲其祖舜古爾岱所遺騎都尉世職。十年，使回。……<sup>⑮</sup>。

事實上此兩書所根據的是同一資料，就是清代國史館所撰纂的托時本傳。然而兩書的措詞遣句，卻略有不同，顯示此兩部書的內容是摘錄而非全部抄襲。可是托時本傳本身並未納入清史稿及清史兩種正史之內，所以這段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就鮮為人知。惟北平故宮內卻儲藏着一部份俄文檔案，直到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始由故宮博物院的王之相與劉澤榮二人整理，把其中帝俄政府在一七六〇年至一七五七年間對中國所發的二十三件公文譯為中文，並予以發表，編列為第二十三號檔案的公文是一七五七年五月二十日俄國樞密大臣致中國國務大臣的函件，係有關滿清帝國征滅準噶爾最後一個統治者阿穆爾薩納（Amursana）時的一段交涉，文中回

<sup>⑭</sup> 陳康祺，fl. 一八七一，郎潛紀聞（上海，一八八二），卷五，頁 1b。

<sup>⑮</sup> 李桓，一八二七——一八九一，國朝耆獻類徵（湘陰：李氏刊本，一八八四——一八九〇），卷七十二，卿式傳三二，頁 39a。

述到一七二九年至一七三三年兩次遣使赴俄之事及當時談判的內容，由此可以看出當時雍正皇帝的談判計劃，也可以證明俄方資料的可靠性。此一公函實際上是對清廷於一七五六年十月十三日發出兩項公函的答覆，並因滿清政府未能遵守托時於一七三一年在俄京所締協議而提出的控訴。公函的前半部是一七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清廷致送俄方兩項公文的摘要，後半部才是俄方的答覆。原文甚長，現在只將其要點摘述如下：

清方第一項去函係要求俄方引渡準噶爾叛酋阿穆爾薩納，因阿穆爾薩納兵敗逃入俄屬吉爾吉思哈薩克（Kirghiz-Kazakh）境內。清廷第二項去函謂清軍將領因追擊烏梁海逃亡入俄境的不法之徒，到達伊爾庫茨克的國界之上，要求俄方交出逃亡之輩，而俄方以此輩人等自行入境歸向，不願交出。因此清方不滿。欲令軍隊武力進入俄方前哨地方，自行捕捉。第三部份才是俄方答覆的正文，為第二十三號公文的重心所在。公文首先說明與清俄兩國為鄰的準噶爾民族，迄今未曾屬於任何一國，係處於自有君主的統治之下。然後回溯一七三一年清廷派往俄廷的大使侍郎托時及其隨員曾要求俄方收容準噶爾所屬各部落逃往俄境之人，並嚴加管束，務使不能在國界一帶再作任何騷擾行動，惟請俄方將逃亡者之中的王公貴族交付清方。托時大使並曾向俄方聲明，清廷願在佔領準噶爾土地時，分割若干部份土地予俄方。

此次清方對準噶爾採取軍事行動以前，該民族已發生內爭，彼時就有大量逃難之人請求歸化俄國。就情理而言，清方對準噶爾之征伐不能妨礙準噶爾人之志願歸化俄國。何況清方對該民族實行軍事行動與進行搜索之時，並未預先通知俄國，因此現已歸化俄國之準噶爾人的有關事宜，亦無與清廷協商之必要，因此等事曾經托時大使議結在案。但清方於一七五六年以兩千名軍隊在托姆斯克侵入俄境，要求交出業已歸化俄國之準噶爾人，依兩國現行條約（指一七二七年所訂恰克圖條約）第十款之規定，應禁止以武裝越過國界。又依照一七三一年赴俄大使（托時）之提議，視此等歸向俄國之準噶爾人為不安分之徒，均將由國界移至內地遠方各處，希望清方也採取同樣步驟辦理。再者，清方既聲明準噶爾已入滿清國籍，則俄國對準噶爾人戰時在邊沿所造成之一切損失有向清方要求賠償權。在另一方面，吉爾吉思及哈薩克民族均屬俄國國籍，清方如對該民族中之俄屬人民實行戰爭，與現存清俄兩國之友好關係不合，應與俄方協商辦理。至於清方所要求引渡之阿穆爾薩納現在何處，俄方尚不明悉。並指明清方所要求交出之準噶爾人並非中國本族人民，不能

依現行條約辦理，然當以雙方友誼關係另行商辦<sup>④</sup>。

此一俄方文件雖然是十八世紀中葉準噶爾覆亡時所發生的一段交涉，可是俄國政府所依據的準則多是托時使俄時的建議及談判的協議，可見他們把這些文件都存放在時常應用的範圍之內，然而在中國的檔案中卻沒有發現任何托時赴俄談判的紀錄或奏章。第二十三號公文之能够保存到現在，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公文本身為俄文的，沒有引起清廷官吏的注意，如果它是中文的，恐怕也被銷毀了。

查考第二次赴俄使節團團長究竟是誰的問題比第一次的更難解決，因為不但清史稿、滿州名臣傳、皇朝文獻通考、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等官吏中沒有任何紀錄，即或朔方備乘與郎潛紀聞等私人所撰的史料書籍中也沒有任何線索。只有已故郭廷以先生所著的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中一七三一年項下有「再遣使往俄（一七三二抵聖彼得堡覲見）」之句<sup>⑤</sup>，惟未提到使臣的姓名及出使詳情。另外在他所著近代中國史綱一書內也有一段關於此事的記載：

……是年清軍進剿準噶爾，雍正特知照俄方，如準噶爾人逃入俄境，可予收納。一七二九年至一七三二年間，圖理琛再度赴俄，希望俄對準噶爾問題與中國取合作態度。大致看來，康、雍兩朝，俄人頗受優遇，對於中國實亦了解較多<sup>⑥</sup>。

郭廷以的著作雖非原始資料，可是他的史學淵博，盡覽中外羣書，他的著作係根據原始資料而寫成是毫無疑問的。他已察覺到雍正時期確有第二次遣使赴俄之事的在，但未暇追蹤查考這次的使臣究竟是何人，在前面的引文內又誤植此兩次的使臣為圖理琛。事實上圖理琛在一七二九年至一七三二年之間因犯案流放到外蒙古築城服刑，至一七三五年乾隆帝即位後方將他赦免復職<sup>⑦</sup>，所以他在這個時期之內絕無擔任使臣到俄國去的可能。

然而在俄史的資料中卻明白的記載着第二次赴俄大使是 Desin'，說他在清廷的官職是內閣學士<sup>⑧</sup>。本文作者對此一名字的諧音及所述官職作一番推敲研究之後，斷定他是德新。官私史料書籍中雖然沒有他的傳記，可是在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中

<sup>④</sup> 俄國來文原檔 (Arkhivnye materialy na russkum iazyke iz byvshego imperatorsko dvortsa) (北平：故宮博物院，一九三六) No. 23, pp. 304-312.

<sup>⑤</sup>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三），Vol. I, p. 23.

<sup>⑥</sup>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九），Vol. I, p. 25.

<sup>⑦</sup> Chao-ying Fang, "Tulisen" in Hummel, *op. cit.*, Vol. II, pp. 786-787.

<sup>⑧</sup> Mark Mancall, *op. cit.*, Vol. 9, p. 106, n. 32; Bantysh-Kamensky, *op. cit.*, p. 191.



他的名字卻出現多次<sup>54</sup>。實際上德新就是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的主要編纂人之一。他在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已由翰林侍讀學士陞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sup>55</sup>。俄史資料中說他的官職是內閣學士而未提及他的兼職禮部侍郎，這種只記述他的主要官職在原則上是正確的，而且顯然與托時之從未陞至內閣學士和只有一個「賞侍郎銜」的資歷有著很大的區別。由此可以證明第二次使節團長絕非第一次使節團的團長托時。所以加州大學的徐中約教授在他的近代中國之興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一書中認定兩次使節團的團長均為托時的論斷是不正確的<sup>56</sup>。

## 七、清廷為何隱諱遣使赴俄之史實

清代初期與歐洲國家有往來的不多，曾與之締訂條約並保持正式外交關係者僅俄羅斯一國。當時清廷處理外交事務，事實上並不似後世人所想像的那樣無知。通常清廷如果有某種與外國有關的事件發生而需要委派外交人員處理者，必定以上諭的方式將此事交由各部大臣們議覆，再由皇帝根據這些議覆的意見而決定人選，然後由理藩院對被選派定的使臣指示處理某種外交事件的原則，使臣們自己也要提出談判的具體計劃之奏摺。最後還要陛見，向皇帝領取訓令。使臣在任務完畢之後，一定要有奏章呈報皇帝，敘述出使的經過及任務是否達成的原委。這種辦事的程序之事例。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何秋濤的朔方備乘、圖理琛的異域錄、以及各皇帝的聖訓等類的書中都可以看出。清廷派遣使節遠赴俄廷之事，正發生在滿清鼎盛之際，又在清俄已經締結尼布楚條約及恰克圖條約而對國際間的協議有了相當認識之後，必不致草草了事，當無可疑。何況當時的統治者又是以嚴峻不苟著稱的雍正皇帝，如果說像此一請求俄國助清以摧毀強敵準噶爾的大事，當時竟毫無紀錄，無論就法制與情理而言，恐怕絕不可能。這必定是後來事過境遷，發覺此一外交事件對朝廷之體制及國威有礙，不便讓此類的紀錄留之於後世，遂將有關此事的文獻予以有計劃的銷毀。然而目前本文內下頁所提出的銷毀這些史料的因素，都是假定性的推測，只能作為以後求證的一種線索，而不能作為結論。

我們在分析清廷為何要隱諱這一類史料的因素之前，應先回顧一下早期清俄外

<sup>54</sup>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同前），卷三二，頁 8b；卷三六，頁 7a；卷五一，頁 16b；27a；卷一三六，頁 2b。

<sup>55</sup> 同前，卷三二，頁 8b。

<sup>56</sup> Immanuel C. Y. Hsü, *op. cit.*, p. 156; 陳復光，（同前），頁五八。

交的一般情勢。中俄兩國因為同居歐亞大陸領地接壤之故，所以兩國之間在十七世紀的初年即已發生商務及外交的來往，此種來往，當然與蒙古統治時期的宗藩關係不同。根據西人的記載，公元一六一七年（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即有俄國商隊經朝廷允許進入北京貿易。次年，有名伊凡·裴特林（Ivan Petlin）者，自稱是托波爾斯克總督古拉金親王（Ivan S. Kurakin）所派遣的使者經蒙古到達北京，他雖然未得覲見萬曆皇帝，卻獲得萬曆帝的一封上諭，內中宣稱使者曾受明廷優渥的招待<sup>⑤7</sup>。第一次到達清廷的俄國正式使臣是巴濶夫（Theodore T. Baikoff），他是當時俄國沙皇亞歷克西斯（Alexis MiKhailovich, 1646—1676）所派遣，並攜帶着沙皇致滿清順治皇帝（一六四四——一六六一）的國書，於一六五六年抵達北京，他態度粗率，拒絕向清帝行叩首禮，又任意派隨行的商人離開京城，四處作商務活動，使朝廷官員大為不悅，因而不允他覲見，但特許使團買賣中俄貨物後離京，臨行前還獲得一封上諭，作為他抵達北京的憑證。但俄廷並未因此而減低其通清的熱誠，又於一六五八年派了一位名伊凡·彼瑞里夫（Ivan Perilieff）者來華，到北京時已是一六六〇年，清廷大臣仍因為不合中國的傳統體制而不許他覲見皇帝，可是所給予的招待卻非常隆重，並讓他們買賣中俄貨物後攜帶着清帝厚賜沙皇的禮品，於一六六二年離京返俄<sup>⑤8</sup>。

比較順利的溝通開始於康熙時期（一六六二——一七二二）；那個時期，清俄兩國在黑龍江流域的雅克薩地帶發生了斷斷續續的衝突，清廷非常不滿，要求俄方解決逋逃犯的問題。俄方駐守尼布楚的總督雅爾靳斯基（Daniel Archinsky）應邀於一六七〇年派米洛凡諾夫（Ignatii Milovanov）帶領了十名哥薩克（Cossacks）到北京來，由於他的機變，得以覲見康熙皇帝，領得一封康熙皇帝致沙皇的公函離去<sup>⑤9</sup>。俄廷收到康熙的公函後，又派遣了一位名尼果賈（Nacholai G. Spathar）到中國來。尼氏是一個希臘學者，隨行人員有兩名秘書和數名科技專家，於一六七六年三月經尼布楚抵達北京，受到理藩院尚書與南懷仁神父（Jesuit Father Ferdinand Pere Verbiest, 1623—1682）的熱烈歡迎<sup>⑥0</sup>。尼氏態度倨傲，堅持不願行跪

<sup>⑤7</sup> John F. Baddeley, *Russia, Monoolia,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919), Vol. II, p. 72.

<sup>⑤8</sup> 蔣良騏，東華錄（同前）順治朝，卷五，頁26a；；嵇璜，皇朝文獻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萬有文庫版，卷三〇〇，頁考七四八一；Cahen, *op. cit.*, pp. 33-35.

<sup>⑤9</sup> Michal N. Pavlavsky,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9), pp. 140-141; Fu-Kuang Chen, "Sino-Russian Relations Since 1689", in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 (April-June, 1929), pp. 483-485,

<sup>⑥0</sup> Gaston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 Transl. W. Sheldon Ridge, *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 (Shanghai, The National Review Office, 1914), pp. 2-3; 嵇璜，同前，卷三〇〇，頁考七四八二。

拜禮，康熙帝特別降旨免除，以西方見君禮覲見。康熙帝氣度開朗，覲見時與尼氏從容談論，詳詢沙皇的年齡以及尼氏本人對哲學、數學及三角術的造詣，隨後賜宴並賜沙皇禮物，因尼氏接受時不願行禮，所以未舉行任何儀式。清廷因之也不給予上諭，但允許南懷仁神父以私人名義寫一封拉丁文的信，證明尼氏已完成他的出使任務<sup>①</sup>。

尼布楚條約締結之後，清廷對俄方的了解更有深遠的進展，滿清帝國與俄羅斯東部的國界及商務關係既經約文明訂，因之雙方的商務及外交的活動一時頗為頻繁。當時準噶爾與清帝國之間的戰亂擾遍了中國西北部的邊疆，清俄的往返並未因此而中斷。俄國彼得大帝還在一六九二年派遣了一個規模龐大的使節來華，由雅布蘭(Izbrant Ides)率領，於一六九三年到達北京，隨行的外交及商業人員達四百名之多，雖然所携彼得大帝的國書不合中國傳統的模式，但未構成雅氏呈遞國書的障礙，覲見時康熙帝詢問他是否能識拉丁、意大利、葡萄牙等國的語文，又問莫斯科距離北京、意大利及波斯的水陸路程，最後問及俄國沙皇是否還在與瑞典從事戰爭。談話內容顯示出康熙帝對歐洲的語文及國際大勢都有相當廣泛的常識<sup>②</sup>。同年，康熙帝發佈上諭，命在北京建造一幢俄羅斯館，以為俄國使臣及商務人員的招待之所<sup>③</sup>。在俄國方面，彼得大帝也向清廷表示更進一步的友好之意，於一七一六年選送了一位英國醫生到清廷來為康熙帝服務，又派了一名瑞典籍的工程師為常駐北京的商務代表。英國醫生名卡爾文(Carwin)，商務代表名郎格(Laurent Iang)。兩人留華期間，時常與康熙帝見面，就俄瑞間的戰爭及西洋醫學等類的話題作任意的交談或討論。一七一九年，彼得大帝又派遣伊思邁洛夫伯爵(Count Izmailoff, 1685—1738)為特使來華，以圖解決因日久弊生的商務糾紛。伊氏為丹麥後裔，受俄封為伯爵，隨從人員達九十人，包括科技專家、譯員、秘書、蘇格蘭醫生比爾(John Bell)及前此曾駐北京一年半的郎格<sup>④</sup>。伊氏風度頗佳，雖強調他係沙皇代表的身份，但正式陛見仍行中國傳統的跪拜禮，康熙帝也特別優容，破除舊例，親手自伊伯爵的手中接過俄皇的國書及禮品，並隨即聲稱俄羅斯是與大清帝國平等的友邦，沙皇也是與他同等的鄰國君主。然後又從容的與伊氏閒談到天文學與數學等

① Joseph Sebes, S. J.,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y.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ra S. J.* (Rome, Hitoricum S. I., 1961), p. 66.

② Gaston Cahen, *op. cit.*, pp. 36-37.

③ 何秋濤，朔方備乘（同前）卷一二，頁四——五。

④ Gaston Cahen, *op. cit.*, pp. 69-70; Fu-Kuang Chen, *op. cit.*, Vol. 10 (July-August, 1926), p. 727,

學術問題。伊氏說歐洲各國都已知道皇上對西方科學有濃厚的興趣，並且也知道皇上嚮有敦睦鄰邦的善意。賜宴之後，康熙帝又提到清俄兩國商旅常為遙遠而荒寒的路途所困，建議俄方採取伊爾提西河的水道運輸，估計由該河航運三個月即可抵北京。伊氏留京三個多月，康熙帝共召見了他十一次，詳詢歐洲各國情況、俄國的政治制度、俄國新都聖彼得堡與舊都莫斯科形勢的優劣。並且還請伊氏參加閱兵典禮及狩獵活動<sup>65</sup>。其中多次係非正式的晤談而沒有嚴格的行陛見的禮節。一七二一年三月，伊氏携帶着康熙帝后贈予俄國帝后的豐厚禮品及上諭離京返俄，郎格則獲准以商務代表的名義繼續留駐北京<sup>66</sup>。

最令人詫異的是生性嚴酷的雍正皇帝所持的對俄政策反比康熙時期的更為寬和；俄廷從清廷理藩院於一七二三年六月發給西北利亞總督的公函中體會到這種轉變，立刻就派上年回俄的郎格再回西北利亞去，在那裏與清廷所派出的兩位高級官員（姓名不詳）完成一項初步談判，同時向清方通告：俄廷即將派遣一位顯貴率領一個正式使節團前來北京。這就是指後來到北京談判恰克圖條約的薩瓦（Sava Vladislavich, d. 1738）全權特使<sup>67</sup>。薩瓦為一位有經驗的外交家兼商業鉅子，他率領隨員一百二十人，由一千五百名士兵侍衛，於一七二六年抵達北京，受到清廷隆重的接待，陛見之時，雍正帝特以優禮相待，親手接取他呈遞的國書<sup>68</sup>。在另一次的陛見中，雍正帝又向他提出大清將以公平及和平的原則與俄羅斯相處的保證<sup>69</sup>。這種異常親善的態度，實是恰克圖條約終能締結成功的基礎。而這些事實均足以顯示康熙與雍正兩位君主是具有自發的意願，要與俄羅斯維持和睦的邦交，訂約分界，從來未將兩國的關係納入宗主國與藩屬國的架構之中，這與鴉片戰爭以後的被迫情形完全不同。當然康熙帝開明而寬容的性格為形成此種意願的一部份原因，但是最基本的因素還是由於他對歐洲及俄國的政教制度有相當的了解。雍正帝卻是想爭取俄國的協助或中立，所以才不惜卑辭厚禮以換取俄國的合作。他所安排的棋子到乾隆統治的初期都發生了有利的功效。乾隆皇帝之對準噶爾採取軍事行動，雖然是憑着強盛的國力，但他也看清楚了他祖父和父親傾注全部兵力與準噶爾纏戰了四

<sup>65</sup> Gaston Cahen, *op. cit.*, pp 75-76; R. M. Martin,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London, James Madden, 1847), Vol. I, p. 390; Fu-Kuang Chen, *op. cit.*, Vol. 10 (September-December, 1926), p. 936.

<sup>66</sup> Gaston Cahen, *op. cit.*, pp. 76-77.

<sup>67</sup> *Ibid.*, pp. 84-85.

<sup>68</sup> *Ibid.*, pp. 84-85; 89-94; 嵇璜，（同前），卷三〇〇，四裔八，頁七四八五。

<sup>69</sup> Gaston Cahen, *op. cit.*, p. 98.

十多年之久而尚未能把準噶爾擊潰的事實，這種歷史上的啟示使他在初期仍遵循着雍正帝的政策，即從對俄的外交準備着手，再進一步的完成擴展大帝國的雄圖。在他統治的初年中：即或發生了幾項邊界糾紛，都很慎重的應付而未致影響其軍事目標<sup>⑩</sup>。當時的俄國亦因志在東歐及近東求發展，無暇顧及東亞，所以對滿清大致採行協調的政策，以便保持其既得的通商之利。

清廷在摧毀準噶爾而在天山南北路建立了統治權之後，並未依照一七三一年托時大使訪俄時所作的承諾，把準噶爾屬地的若干部份讓與俄國，俄方只在第二十三號公函中一為提及，並未根據上項協議而堅持其要求。後來俄方允許送驗準噶爾部酋阿睦爾撒納的屍體時，清廷在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所發的上諭中有承認俄方向能「…謹守舊約…」<sup>⑪</sup>之句；這當然是指托時大使訪俄時以換文的方式所達成的協議，可見當時此一談判紀錄的文件仍舊保存在政府的檔案之中，而且乾隆皇帝以及朝廷的官吏都能在適當的時機予以適當的應用，並未由此一文件而引發任何爭議或忌諱。如果說在清廷朝政的發展中出現某些因素以促使清廷採行隱諱此類文件之措施的話，那必定是乾隆二十三年之後的事了。

再從滿清帝國擴展疆土的發展過程來看，準噶爾事件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此乃由於準噶爾是滿清所遭遇到的唯一強敵而又與歐洲國家有外交牽涉的民族，征服了準噶爾及天山南路以後，滿清建立大帝國的基業可說是已大致完成，自後三十三年中雖也斷斷續續的在邊疆及內地用兵，但就軍事上的規模和外交上的籌劃而論，實與準噶爾用兵之艱鉅有天淵之別。這難怪乾隆帝自後在上諭中常提到「從前聖祖世宗屢申撻伐」而未能成功，他自己卻能「克集大勳」一類的言論，後來甚至誇示他的勳業是「於古誠希，示後有述」<sup>⑫</sup>。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仍舊讓那些請俄助清以滅準噶爾的外交文件載入官史之中，不但對乾隆帝輝煌的十全武功有礙，而且托時和德新兩位大使對俄國安妮女皇行三跪九叩禮的紀錄實有損於清帝國的國威。清廷這種態度到後來英國派遣馬嘎爾尼（Macartney）及亞姆哈斯（Amherst）兩位大使到中國來時表露得更為明顯。不過僅就滿清帝國單方面的因素而企圖隱諱這些紀錄和協議也不可能一步就達到目的，俄國政情的發展也有助成這些外交文件消失其時效的情況存在。我們仔細研究雍正帝對俄的外交動向就發覺他對中俄國界的問題

<sup>⑩</sup> 陳復光，（同前），頁五八—五九；六三；六四。

<sup>⑪</sup> 王先謙，東華錄（同前），乾隆朝，Vol. II，卷一七，頁 2a；Mancall 認為有關此一史實的資料係雍正帝所銷毀，此點與本文作者的見解不同，請參考 Mancall, *op. cit.*, Vol. 9, p. 102.

<sup>⑫</sup> 同前，Vol. II. 卷一四，頁二五 b；Vol. V，卷四二，頁 20b。

有一套解決的準備；尼布楚條約已劃清了東北邊界，當然不在話下。他即位不久，就積極的與俄國締結恰克圖條約，以謀確保外蒙古。隨即又派托時遠赴俄廷，就是計劃將於解決準噶爾之後再確定西北的中俄國界，更不惜預先提出割讓若干土地與俄的承諾，用意即在確保西疆。無奈到乾隆帝決定向準噶爾進兵時，俄國的安妮女皇早已去世，在位的是彼得大帝的幼女伊麗莎白（Elizabeth, 1741—1761）女皇，前朝當政的大臣如奧斯特爾曼、慕尼赫（Munich）、哥洛夫金等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代之而起的是副國務大臣貝斯圖色夫、瑞尤明（Bestuzhev Riumin），他集中其注意力於歐洲，從事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sup>⑦</sup>。對中亞方面，由於地理環境及宗教等因素，俄廷的主政者都缺乏進取的興趣。第十九世紀的五十年代以前，俄國與中亞的遊牧部族之間實無確定的國界，屬於他有效控制之內的，只是從烏拉河（Ural River）西北方沿着緯線五十一度東至阿爾泰山脈之北的地區。伊犁河下流以西的哈薩克（Kazakh）及布魯特（Buruts），既不屬俄國，也未屬滿清，雙方雖聲稱對此一地區的部族有宗主權，事實上兩國都鞭長莫及，軍事與行政的力量並未滲入各部族之中。加之乾隆帝在征服了天山南北路以後，即在上諭中表示業已滿足而無再行西進的意圖<sup>⑧</sup>。在另一方面，俄國也正忙於應付波蘭、巴爾幹及克里米亞（Crimea）的戰爭與奪取，沒有任何經略中亞的計劃。何況中亞疆域遼闊，庭戶遙遠，即或當時清廷要與俄方締結邊界條約，也缺乏着手的共同依據。這種情勢使清俄在中亞的國界問題冷卻了很多年，經過了一段冷淡的歷程之後，已完成全盛文治與武功的乾隆皇帝，當然不願再保留這種曾向俄人「求助」的外交文件了。

## 八、尾 聲

我們詳細分析了雍正時期的一幕清俄外交活動之後，就可以明白的看出在康熙初年清廷即已察覺俄羅斯是歐洲的一個大國。在兩國的接觸中，清廷也沒有以天朝自居而卑視外邦的傲慢氣派。雍正帝派遣托時大使遠赴俄廷舉行談判，其動機是基於事實需要，沒有像十九世紀以後為列強所迫的情勢存在。德新大使赴俄完全是基

<sup>⑦</sup> Michael T. Florinsky, *Russia: A History and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61), Vol. I, pp. 453; 454; 456.

<sup>⑧</sup> 王先謙，東華錄（同前），乾隆朝，Vol. II，卷一七，頁 1b; 2a; 2b; 4b.

於尊重一位新即位的俄國女皇之國際禮節，同時謀取雙方對托時大使所達成的協議的肯定與保證。這兩次的談判與活動大體上是成功的<sup>⑤</sup>；從此以後，使俄國從親準轉變到親清，這在清方對準噶爾採取軍事行動時發生了很大的正面效果。此種成就並非倖至，應該歸功於雍正帝的嚴密籌劃而來。使臣們注意到韃靼人兩屬俄準的國籍問題，可見他們已能認識國際錯綜問題的重要性。清廷希望俄廷為中介以圖與土耳其建立邦交，固然沒有實現，但清廷在解決西北回民問題的誠意與國際眼光是很明顯的。這種對國際間事務的看法與談判，都顯示清廷已有國與國之間須如何相處的醒覺，並非像毫無立國原則的部落君主了。最後需要指明的一點，就是這兩次使節團中都沒有天主教士隨行以擔任翻譯的工作，這一點可以作為雍正帝有意引進東正教抵制天主教的註腳，至於當時由什麼人擔任翻譯，沒有明確的紀錄，但兩次使節團的隨從人員很多，其中或有北京俄羅斯館內學習俄滿漢語文的中俄學生隨行，也未可知。再者，托時自俄京回北京時，距離中英簽訂南京條約的那一年有一百一十年之久，而當時的清廷能運用外交的談判，以助成清帝國對一個強敵的戰爭及征服，就其外交的技巧而言，反比鴉片戰爭時及稍後的一般主政者要略勝一籌。這種現象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清廷所作最短視的事情就是銷毀歷史資料的政策，這一段中俄外交的史實，如果沒有俄國文獻的補充，恐怕已經湮沒，無聞於世了。俄國資料書籍中最為詳盡的應以 N. Bantysh-Kamensky 所著自一六一九至一七九二年間的中俄外交史 (*Diplomaticheskoe Sobranie Del mezhdru Rossiskimpi Kitaiskim Gosudarstvami s 1619 po 1792 goda*) 一書為首，這是一本完全根據俄國外交部的檔案所寫的巨著。完成的年代大約在十八世紀的末年，一八〇三年出版。本文作者到一九八三年的夏季才在哈佛大學得到此書的複印本，由於此乃十八世紀的俄文，又因版本已歷時久遠，對本作者而言，看起來實在異常艱澀，所以多藉重 Mancall 的英譯，不過本作者就所引用的內容與原本書仔細的核對過，除了一兩處引用頁數略有出入外，大致正確。本文引用外文之處則採自由的意譯，力求接近口語而不為外文語法所侷限。如果有任何錯誤，當由本作者負責。第二本重要的書籍是 Gaston Cahen 的中俄關係史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up>⑤</sup> Mark Mancall 認為此兩次使節的任務都不算成功，這一點與本文作者的見解不同，因為他根據 Bantysh-Kamensky 的書中所說（見該書頁一六八）清廷有意請俄國出兵助清攻擊準噶爾，此點與解送準噶爾部酋至清方議處都沒有得到俄方的同意。但是到乾隆對準噶爾用兵時，俄國大致還是採取了合作的態度，不但沒有協助準噶爾，並且還把準噶爾逃入俄境的部眾解除武裝而禁錮在內地，這不能不算清方用兵成功的重大因素之一。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書中敘述清俄早期的外交及商務關係非常詳細，不過沒有寫到托時使俄的事蹟。此書係於一九一二年在巴黎出版。可惜現在這兩種書都絕版了。不但如此，連俄國外交部的檔案也在拿破崙攻陷莫斯科時大都被焚了。第三本書提到清廷遣使赴俄的是 R. M. Martin 所著的中國 (*China*) 一書；書中有「清廷第一次遣使赴俄，於一七三三年到達聖彼得堡」之句，語焉不詳，未提使臣名姓，年代也不太正確。這本書是一八四七年在倫敦出版，著作者是在到過中國的傳教士，他能注意此一史實，已很難得了。第四本提到托時使俄的是陳復光所著「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一書，他似乎只約略的根據前兩種書，並未查閱陳庭祺的「郎潛紀聞」及李桓的「國朝耆獻類徵」等中文資料，而且誤認第二次赴俄大使也是托時，加州大學的徐中約教授就根據陳復光的書而在他的著作中重述了此一錯誤。故宮博物院所藏「俄國來文原檔」是很有價值的原始文件，可惜不是當時托時大使在俄廷的談判紀錄。自耶魯大學畢業現在斯丹佛大學任教的 Mark Mancall 在撰寫他的論文時，曾參考上列數種西文書籍，但是未查閱東華錄、世宗實錄及高宗實錄等書中的有關資料，他對德新一無所知。本文作者所查閱過的中外書籍很多，所以才敢斷言有關此一史實的資料已自官史中銷毀。至於所根據的參考書都在註釋中註明，遺漏之處，仍恐難免。希望日後還有更多這一類的資料出現。(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歷史系的俄國史教授)